

改革深化期的市民心态调查

刘 崇 顺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肇始于农村，经历了由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的发展过程。城市改革，实际上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为重点，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1988年，改革进入第10个年头，工资、物价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但是，整个国家经济环境恶化，改革难以直线推进，而只能在对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的治理整顿中曲折前进。

为了研究改革背景下，特别是改革走向深入时期城市社会的心理状态，我们自1986年开始了考察工作。1986年第3季度，以社会职业作为划类标准，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武汉市10个职业群体（国营企业工人、集体企业工人、商业服务行业职工、城郊农民、个体工商户、党政机关干部、企业管理干部、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人员、大学生和研究生）1200人进行了调查。两年后，1988年9、10月间，我们又以同样方法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调查样本减少一半，为600人。与此同时，还对深圳和兰州两城市开展了同等大小样本的问卷调查，三个城市的调查一直持续到1989年初。同武汉相比，深圳和兰州在改革进程、开放程度以及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地理区位、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存在较大的差异，它们分别代表了类型完全不同的城市，这就使调查结果具有较大的概括性。

在1988年的调查中，为了简化调查对象分类，我们将某些相邻的或具有包容关系的群体加以合并，确定为工矿企业职工、商业服务行业职工、各类专业人员、党政群机关干部、个体工商业者、城郊农民、大学生和研究生等7个大型群体。

根据以上两次调查获得的数据信息，同时辅之以其它有关资料，本文拟就改革深入发展时期城市社会心理状态的若干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概括和分析。

一、日常情绪反应

为了考察人们在变革时代的情绪反应，作者在1988年对武汉市市民的改革心态的调查，就600个调查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感受进行了测量，结果如下：

1. 国家落后，社会进步缓慢，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机之中。（有此种感受的占41.2%。以下只注明百分比，且只注数值而略去百分号）
2. 时不我待，我们再也不能丢掉当前的发展机会了。（52.3）
3. 社会生活乱了套，很多事情没法说清楚。（71.7）
4. 人们难得互相理解，没有知心朋友，孤独寂寞。（39.7）
5.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一切都看穿了，就那么回事。（43.7）
6. 改革改革，改来改去，问题越来越多，人心越来越乱。（58.3）
7. 工作吃力，生活艰难，无法摆脱无形的压力。（36.2）

8.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常常令人烦恼不快。(66.8)
9. 什么理想、前途,都是假的,活一天算一天。(25.7)
10. 生活充满阳光,心情舒畅,前途大有希望。(38.3)

以上情绪感受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如第1、2、10项,这些情绪感受,积极健康、乐观向上。其余情绪感受都比较消极、悲观。测量结果显示出,怀有这些消极情绪的人,比例大多不低。从总体上看,整个社会情绪似乎低沉了一些。但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52.3%)对于国家强盛、民族振兴怀有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紧迫感,反映了整个社会情绪的本质和主流。

当然,我们也不讳言社会情绪的消极面。有半数以上的调查对象称自己怀有7种消极情绪感受中的4种,这是改革进入深化期的特有的社会心态。利益关系的调整,使得人们的利益冲突尖锐化,维护既得利益和追求新的利益的矛盾更加激烈。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两种体制的摩擦加剧,而各自的功能都难以充分发挥,出现社会管理失控、社会生活失范,许多社会规范,包括道德规范、行政规范乃至法律规范都显得疲软,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混乱无序的现象。特别是1988年,经济过热,消费过热,物价上涨过快,人们在心理上一时难以适应,对改革产生某些怀疑,这是不奇怪的。加上干部队伍中的某些腐败现象得不到有力的惩治,致使人们的不满、失望情绪增长。而调查是在1988年9月份进行的,正是人们不满和失望情绪很强烈的时候。

相比之下,1986年第三季度对武汉市1200名市民所进行的改革心态调查,结果就大不相同:

1. 心情非常舒畅。(9.72%)
2. 比较轻松愉快。(36.41)
3. 偶尔有些烦恼。(43.99)
4. 净是些不顺心的事。(8.57)

测量结果显示,情绪积极健康或较为积极健康的人数比率相加,合计91.22%。时隔两年,在1988年的调查中,竟有66.8%的调查对象经常感到“烦恼不快”,所占比率高达2/3以上。这种变化,正是改革进入深化期,社会心理冲突加剧的反映,同时也是1986年至1988年这两、三年时间,改革遭到挫折,人们对改革的理想期望同现实之间的心理反差的反映。

那么,人们的情绪为什么低落?在1988年的调查中,我们对当时人们最感忧虑的问题作了征询,结果如下:

最令人忧虑的事	(人数%)
1. 物价上涨,生活无保障	73.7
2. 社会风气不正,道德水准下降	68.0
3. 特权现象愈演愈烈	45.2
4. 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泛滥	37.3
5. 教育、科技落后	27.8
6. 政策易变	13.3
7. 工作不稳定,“铁饭碗”保不住	8.2
8. 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7.4
9. 社会上封建主义观念根深蒂固	6.7

10. 改革不彻底, 半途而废	5.8
11. 在竞争中失败	2.8
12. 极“左”思潮仍然大有市场	2.2

结果表明, 物价上涨过快、过猛是城市居民最感忧虑的居于首位的问题, 武汉市是如此, 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在我们所调查的三个差异较大的城市中, 武汉市有73.7%的调查对象对物价上涨最感忧虑, 深圳则甚于武汉, 达75.3%, 兰州的比率尽管相对于武汉和深圳要小些, 但仍有59.4%的比率。据作者接触的其他一些调查材料, 在这一点上结果都是一致的。例如,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8年对城市居民心理状态所作的一次调查, 城市居民对物价的关心, 在他们所最关心实际上也就是最担心的几个问题中居于首位。

当然, 社会心理, 人们的日常情绪所反应出的问题, 尽管是普遍存在的却未必都是正确的。这就需要加以正确的引导, 否则, 不正确的心理反应、情绪反应, 作为一种社会力量, 就会对改革、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负作用, 从而造成严重后果。

二、对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感受

行为科学认为, 人的行为是受需求影响的, 已经被满足的需求不能成为激励因素, 只有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才能影响人的行为。一旦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能够或正在得到满足, 就会产生积极的心理倾向, 反之, 就会产生消极的心理倾向。为了测量市民生活需求的满足感受, 我们确定15种基本生活需求作为测量指标, 其中包括生存、享受和发展等不同层次的需要, 满足这些需要的感受则分为很满意、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等不同层次。武汉市的测量结果如下:

生活需求	众数 (M _o)	中位数 (M _d)
1. 日常衣着	一般 (61.5%)	一般 (61.5%)
2. 高档服饰	不满意 (37.0%)	不满意 (37.0%)
3. 粮食	一般 (45.7%)	一般 (45.7%)
4. 蔬菜	一般 (33.8%)	不满意 (31.0%)
5. 肉类	一般 (37.0%)	一般 (37.0%)
6. 住房	一般 (31.2%)	不满意 (26.0%)
7. 高档消费品	一般 (37.5%)	不满意 (30.0%)
8. 交通条件	一般 (35.3%)	不满意 (31.7%)
9. 医疗保健	一般 (44.5%)	一般 (44.5%)
10. 文化娱乐	一般 (49.0%)	一般 (49.0%)
11. 人身安全	一般 (47.2%)	一般 (47.2%)
12. 人生保障	一般 (46.7%)	一般 (46.7%)
13. 经济收入	一般 (44.3%)	一般 (44.3%)
14. 职业	一般 (49.0%)	一般 (49.0%)
15. 教育培训	一般 (43.5%)	一般 (43.5%)

上表显示出, 在市民的15种日常生活需求中, 总体上满足的程度是一般: 既满意又不太满意, 其中有几项生活需求 (高档服饰、蔬菜、住房、高档消费品、交通条件等五项) 的满

意程度还要低些。事实上，武汉市居民住房和城市交通及蔬菜供应等方面，一直处于不能尽如人意的状况，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市民对此不满意是很自然的。

从测量结果中可以看出，满意程度较低的需求，大都是生存需求和偏重于物质生活方面的享受需求，而偏重于精神生活方面的享受需求和提高个人素质方面的发展需求的满意程度则相对要高一些。这并不能说明市民在精神享受和素质发展方面的需求已经充分满足了，也不能说明市民对精神享受和素质发展方面的需求所得到的满足程度都要高于对物质享受和生存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只能说明，目前城市居民的需求主要还是停留在生存需求和物质享受需求这种低层次或较低的层次上。

三、价值取向

中国的改革是以谋求社会发展、谋求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奋斗目标的一场革命。因为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目标，对这一价值目标的取向、追求、态度、认知、情绪、情感等等都是价值观的表现。在我们的调查中，大量的调查内容都具有价值观的意义，其中，尤为注重的是价值取向的测量，因为它同改革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

这里，我们只就社会生活价值取向、个人生活价值取向及道德（伦理）生活价值取向这三个主要方面作了测试。

1. 社会生活价值取向。

社会生活价值取向是指对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社会稳定的整体价值目标的需求和选择的心理倾向。在调查中，我们提出10项主要测量指标，请调查对象依重要次序加以排列，结果如下：

1. 社会安定；
2. 个人自由；
3. 社会公平；
4. 法制健全；
5. 家庭安全；
6. 社会发展效率；
7. 个人经济收入；
8. 生活稳定；
9. 不失业（与“生活稳定”得分相同，实际是并列第8）；
10. 民主对话。

前4项社会目标，都是社会进步、社会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人们很自然地将这些目标排列在前，另一方面，这种排列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因为所谓需要，正是生活主体处于缺乏状态而出现的体内自动平衡倾向和择取倾向。

2. 个人生活价值取向。

社会生活价值目标，实际是一种群体目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直接的还是个人生活目标。对此，我们列举了若干类型（9类）生活方式，供调查对象选择。选择结果排次如下：

1. 辛勤工作，生活富裕。（45.5%）
2. 生活轻松舒适不受穷，能享受各种乐趣。（40.5%）
3. 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事业上取得成就。（34.2%）
4. 建立一个美满的小家庭。（25.3%）
5. 勤勤恳恳，为人民作贡献。（17.0%）
6. 不满足现状，开拓、竞争，不断进取。（12.7%）
7. 随遇而安，听其自然，与世无争，自得其乐。（10.2%）
8. 勇于探索，追求真理。（7.7%）
9. 艰苦努力，掌握权力。（3.2%）

从调查对象选择的倾向来看,现代色彩和务实色彩比较突出。表现在:(1)成就欲望较强、序号居3。(2)对基本的生活需要比较注重。(3)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富裕舒适、轻松愉快的生活,追求这种生活目标的人,为数最多。(4)高层次的、抽象的生活目标,尽管响亮动听,但缺乏吸引力。(5)“随遇而安,听其自然,与世无争,自得其乐。”这是典型的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的伦理生活目标。选择这一目标的人次也明显偏低,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更新,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为现代的价值观念所代替。(6)“掌握权力”的价值目标,受到冷落。

3. 道德(伦理)生活价值取向。

人格理想的选择倾向,是道德生活价值取向的重要指标。武汉市600名各阶层市民的人格理想价值尺度,在以下统计结果中集中显示出来:

1.正直、正派(56%); 2.有毅力、能吃苦(55%); 3.宽容、尊重他人(47.2%); 4.有理想(45.8%); 5.勤俭(44.5%); 6.有事业心(37.4%); 7.创新(31.7%); 8.忠诚(29.8%); 9.责任感(26.2%); 10.专心工作(25%); 11.团结、关心他人(21.3%); 12.独立性(15.4%); 13.原则性(15%); 14.忍耐(10.9%); 15.自我克制(10.7%); 16.冒险精神(6.5%); 17.服从(4.5%); 18.注重血缘关系(2.4%); 19.支配欲(0.9%)。

在现阶段,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具有多元和由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转换的特征。相比之下,传统道德的价值更为人们所注重,现代道德在被人们逐渐接受的过程中,又逐渐为传统道德所包容和同化,显示了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强大生命力。

四、消费心理的一般倾向

改革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往往首先敏感地反映在消费生活领域。实行改革以来,人们大多对增加经济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抱有很高的期望。初期,人们也确实普遍得到了实惠,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自1979年起,城市职工多次调整了工资。全国职工工资总额1987年比1982年增加984亿元,相当于1958年到1978年20年中增加的工资总额的2.6倍,居民的消费水平持续上升。据统计,1985年至1987年,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15.3%,1988年城镇居民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比上年又增长22.2%;从1978年到1986年8年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只提高1.15倍,而全社会的购买力却猛增2.85倍。

经济收入的增加,刺激了人们的消费胃口,人们的期望值一般都高于经济收入的实际增长水平,产生了过高期望值和较低承受能力的矛盾。武汉市的情况正是这样。据调查统计,1986年,武汉市被调查居民中生活费支出大于生活费收入的占全部被调查居民的37.5%,其中,因购买高档耐用品致使支出大于收入的占27%。

除了消费期望过高的原因,商品涨价过快过猛也是消费过热、消费超前的重要诱因。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10年间,相继发生过1985年和1988年两次经济过热的现象,与此同时均伴有物价上涨现象发生。尤其是1988年这一次,自发涨价、乱涨价的现象非常突出,造成流通领域秩序混乱。由此引起社会心理的普遍不安,消费者购物保值心理增强,使整个市场受到猛烈冲击。

在1988年6、7月间全国一些大、中城市掀起的抢购商品的风潮中,武汉市的反应十分

突出。从6月16日到6月19日短短几天时间，抢购风席卷全市3镇各大商场。时过一、两个月，8月19日至9月2日，一些大、中城市抢购商品的风潮再度掀起，这一次，武汉市仍然没有漏过。

由于商品价格上涨而诱发的这种消费过热的社会心理无疑是一种病态的心理。物价上涨的经验和对物价调整的过度敏感使得市民们形成了一种难以改变的心理定势，非常容易接受物价上涨的信息，而对于相反的信息则本能地加以怀疑和抵制。在武汉市1988年6月掀起抢购风之前，商品涨价的传闻遍及全市。这时候，商业部门和其他政府机关的公告、声明都无济于事，甚至市长发表电视讲话，澄清社会传闻，仍然毫无效果。市民对于涨价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很多人形成了一种期待型消费心理。有的消费者目前并不急需某种商品，只是担心日后商品涨价，货币贬值，那时候购买不合算，因而提前购买。

城市居民对物价上涨的应变心理，反映了城市居民对物价改革缺乏承受能力。几十年的稳定物价造成了人们对物价的一种超稳定心理，经受不起一点点波动。在武汉市，就连火柴从两分钱涨到三分钱，也有人挂市长专线电话骂娘。对于“宁可发展慢一点，也要稳定物价”的观点，600名调查对象中有15.3%表示“很同意”，有47.2%表示“同意”，两项相加，合计比率为62.5%。对于“物价再上涨，老百姓受不了啦”的观点，更有38.8%的调查对象表示“很同意”，有47.7%表示“同意”，以上两项相加，合计比率为86.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对于物价上涨过快感到不堪忍受。广大市民的这种心态，固然反映了当时经济形势的严峻和市场秩序的混乱，但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经济改革，特别是对物价工资改革的矛盾心情。人们只希望长工资，却不欢迎长物价。在这一点上，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远不如农民。农民不仅是生产者，而且是经营者，物价上涨增加的负担可以摊入成本，自身加以消化，而城市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直接经营者，他们主要通过提高工资收入和奖金收入来提高对物价的承受能力。然而，实际上，他们的收入增长一方面很难同他们迅速提高的消费期望相适应，另一方面也很难同物价上涨的速度相适应。

有鉴于此，要消除市民对物价上涨的病态的应变心理，平抑物价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与此同时，还必须抑制过旺的需求动机，要使人们懂得，僵化的物价管理体系，稳定不变的低物价，必然抑制生产的发展，使得社会再生产徘徊不前。而且，消费过热，必然刺激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反过来又刺激消费欲望，如此恶性循环，最终，苦果还是要广大消费者自己吞食。我们必须懂得，经济规律如同其他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是不可抗拒的。

五、改革态度及其嬗变

为了掌握武汉市市民对于改革的基本态度，我们从认知、情感、动机等各种角度进行了各方面的测量。

1. 对10年改革的总体评价。

武汉市600名各阶层市民的评价是大不相同的，各种评价的人数比率如下：

评价	%
成绩巨大，前景光明	7.7
效果显著，问题不少	70.5
看不出什么效果	9.3

效果不佳
还不如不改

8.3

3.2

对改革成就的各种评价的统计结果表明,对改革成就的肯定倾向占绝对优势。有7.7%的人毫无保留地充分肯定改革的成就,并且对改革的前景怀有满腔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比率高达70.5%的人既看到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又肯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应该说,这种评价也是客观和公正的,因而也是积极和正确的。对于改革给予以上两种公正评价的人数,合计起来,高达78%以上。联系到这次调查是在1988年第3季度进行的,正是改革进入困境的时刻;再进一步联系到1986年的调查,那时有近95%的调查对象毫无保留地充分肯定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对改革在情感上表现出迫切而又强烈的心情。1988年的调查同1986年的调查结果大体一样。这就足以证明,我国的改革事业,得到了广泛的社会理解和支持。

2. 对10年改革的具体评价。

在1988年的调查中,我们列举了对改革的9种评价,请调查对象作出自己的选择。这9种评价,有的比较客观、公正、全面,表现了对改革的积极态度,也有的不够客观、公正,比较片面或偏激,表现了一种对改革的消极态度,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数的方法对各种评价综合评分,并且按照各种评价得分多少(每种评价后面括号内的数字为分数值)排列如下:

1. 改革以来,人们在言论行动上自由多了。(3.74)
2. 改革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3.54)
3. 改革拉开了收入差距,调动了积极性。(3.30)
4. 改革以来人们当家作主的地位提高了。(2.82)
5. 改革使全社会精神文明得到提高。(2.77)
6. 改革使人们的道德水平普遍下降。(2.72)
7. 改革使社会经济生活出现混乱。(2.62)
8. 改革带来了一些混乱和腐败现象。(2.49)
9. 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扩大了不平等。(2.41)

以上9种评价,5种积极评价的得分高于所有消极评价的得分,因而排序在前。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改革发展趋势的主流,也反映了群众对改革认识的主流。尽管10年改革中确实存在种种问题,但多数人不同意将其归罪于改革本身。

3. 对改革的信念、信心。

对改革的信念、信心,集中地在人们对于改革前景所作的预测和判断上反映出来。

1986年的调查结果是:

42%的调查对象同意“改革必定成功,现代化必定实现”。

28%的人态度上有所保留,他们选择的是改革会“有一定成效,但不能令人满意”。

还有28%的人,对改革前途信心不足,选择了“很难预料”。

时过两年,调查的结果如下:

11.8%的人认为改革“一定成功”,对改革的光明前途毫不怀疑。

40%的人认为改革“有希望成功”,也对改革怀有信心。

40.2%的人认为“成功失败难预料”。

5.8%的人认为改革“失败的可能性大”。

1.3%的人认为改革“无法成功”。

以上所列5种判断中只有认为改革“无法成功”，是毫无信心的，而选择这一项的，仅有1.3%。在改革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人民群众能够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已是很不错的了。那么，只要改革继续推进，在实际生活中显示出更多的成效，人们对改革的信念也将会更加坚定，对改革的态度将会更加积极。

4. 对改革态度的变化。

在对武汉市600名市民的调查中，我们列举了城市改革以后开始试行，到目前有的业已推行、有的还未能推行的18项改革措施。意在考察市民们对这些较为具体的改革措施在情感倾向上有什么变化。问卷中对这个问题设计了5种答案可供选择：一、原来反感现在不反感；二、原来不反感现在反感；三、原来、现在都不反感；四、原来、现在都反感；五、无所谓。

按照设计思想，选择一，说明人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增强；选择二，情况恰好与选择一相反；选择三，表现了一种持久的、稳定的积极的情感倾向；选择四与选择三情况相反，表现了一种难以改革的消极的情感倾向；选择五，处于积极和消极之间，情感指向不确定。

调查结果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的改革措施，选择答案一的都大大超过选择答案二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改革措施的情感倾向趋于积极（由消极到积极）的，大大超过趋于消极的。这是一个明显的态势。

调查结果显示出的另一个明显的态势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改革措施，原来和现在都不反感的人数大大超过原来和现在都反感的人数。这就是说，在市民中，表现出一种持久的、稳定的积极的情感倾向的人数，大大超过情感倾向一贯消极的人数。

对于各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情感取向也各有差别。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于“经营不好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的改革措施，人们至今不能接受。对于绝大多数的改革措施，只有“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一条，表示“原来、现在都反感”的人数比率达到32.3%，超过表示“原来、现在都不反感”的人数比率（26.7%）。而且，对于这一条抱“无所谓”态度的人数比率，低于对于其他所有改革措施抱“无所谓”态度的比率。这突出地说明：一、人们对于同自身利益直接有关的改革措施是极为关切的；二、城市职工，目前很难接受失业这样的现实。

其次，人们对其始终怀有恶感的是“厂长、经理辞退、解雇工人”。对于这项改革措施过去和现在一直很反感的有21.2%，加上原来不反感、现在反倒反感的6.7%，近三分之一的人目前不能接受这样的措施或事实。

人们对从根本上动摇职业稳定（即有可能丢掉“铁饭碗”）的劳动制度改革难于接受，但对于有助于自身选择更合适的工作岗位和获取更高的工资收入的改革措施则持欢迎态度。对于各项改革措施过去和现在都不反感的人数比率（%）从高到低排列，前5项依次是：

- | | |
|--------------------|------|
| 1. 人才可以自由流动 | 59.8 |
| 2. 经营好的企业兼并经营不好的企业 | 51.7 |
| 3. 各行各业逐步实行聘任制 | 50.8 |
| 4. 国家职工可以从事第二职业 | 49.8 |
| 5. 科研人员可以停薪留职 | 45.0 |

以上5项改革措施中，其中4项都属于劳动人事和就业制度方面的改革措施。在问卷列举的涉及到各方面的18项改革措施中，这4项措施最受各阶层群众欢迎，这恰恰与前述两项不受欢迎的措施形成鲜明的对照。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许多人支持改革,是希望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改革能够获取更多的新的利益。一旦改革可能危及到自身的既得利益,人们就采取有保留的态度,甚至是抵触和反对的态度。

调查结果还显示出,人们对于政治改革的关切程度,远远不及对经济改革的关切程度高。在调查中,38.8%的人对“各级权力机关实行差额选举”的改革措施表示“无所谓”的淡漠态度。在调查问卷上所列举的18项改革措施中,这一项是抱“无所谓”态度人数比率最高的一项。这一调查结果一方面说明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最直接最实际的利益;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政治改革、推进民主缺乏信心。在调查中,只有1%的人认为“民主选举制度现在推行的程度”“很充分”,有11.2%的人认为“比较充分”,两项相加,只有12.2%。而认为“不充分”的有12.2%,更有47.8%的人认为“完全是走过场”。还有26.7%的人表示自己“说不清楚”。

5. 对改革的参与意识。

问题:你愿意在改革中充当什么角色?

选择	%
1. 积极参与,百折不挠	20.3
2. 看准时机,适当参与	27.3
3. 只随大流,不求出头	32.3
4. 清闲自在,不问世事	8.2
5. 不感兴趣,没有意思	9.0

(以上为1988年的调查)

1. 做改革的先锋,大显身手	11.5
2. 积极投身,献计献策	36.6
3. 看准方向,适时参加	12.1
4. 如有机会,试着干干	15.0
5. 随大流	13.4
6. 参加,但不出头露面	5.6
7. 不参加	1.2

(以上为1986年的调查)

1986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改革持积极态度、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的人数将近一半(48.1%),加上持较积极态度的总计80%以上。与1986年的调查结果相比,198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出较多的消极情绪。

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与前些年宣传舆论和思想教育导向的偏差有关。由于过多地散布了一些对改革的理想主义空气,诱发或助长了人们对改革急于求成,对物质生活期望过高等不切实际的心理情绪。事实证明,无论生活水平有多大提高,无论我们的物质条件有多么大的改善,革命的传统教育和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都是不可缺少的。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谭深